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根据地的 财政实践及经验

齐海鹏 邱 月

(东北财经大学,大连 116025)

内容提要: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如今,中国的综合国力和财政实力都取得了巨大进步,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纪念以往光辉岁月,更有利于着眼未来。本文通过对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下的根据地财政实践的阐述,总结历史经验,从而为党领导新时期财政工作提供一些借鉴。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革命 革命根据地发展经济 财政收支 财政体制

中图分类号:F8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544(2021)08-0028-07

从1927年土地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二十余载的革命根据地时期,这一时期的财政大致可分为土地革命根据地财政、抗日战争根据地财政和解放战争根据地财政三个阶段。这期间中国共产党的财政思想、财政制度不断变化和发展,并在根据地进行了系列的财政实践。我国的革命根据地财政,既具有财政一般性,又具有作为革命根据地财政的特殊性:从财政收入角度看,革命根据地时期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取之于敌的收入、税收收入以及自身经济发展收入等,而财政支出则始终把主要力量放在军费支出上。根据地时期的财政是因革命根据地的存在而产生,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提供财力支持,是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性条件。因此,可以说革命根据地时期的财政实践虽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但其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仍具有重要史鉴价值。

一、土地革命时期(1927年-1937年)革命根据地的财政实践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阶段。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开辟了土地革命时期最早的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此后,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形成了中央、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左右江、湘鄂川黔、川陕、西北等多块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的本质是建立革命武装和工农政权,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因此这个时期财政的主要任务便是保障红军和工作人员的供给,并保障革命战争的一切军事费用。

(一)合理确定财政收入的政策及来源

在土地革命时期,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其财政

[收稿日期]2021-07-19

[作者简介]齐海鹏,财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财政理论和财政史研究;邱月,财政学专业201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财政理论与政策研究。

基础十分薄弱,因此其财政实践也随着革命的进程而不断做出调整。毛泽东同志指出,要实现财政收入有三个重要的手段,即“(一)向一切封建剥削者进行没收或征发;(二)税收;(三)国民经济事业的发展”^①,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筹集革命资金和保障人民供给的财政思路。这三种财政收入手段具体表现为:第一,向封建剥削者进行没收或征发。向一切封建剥削者进行没收或征发也就是所谓的打土豪筹款,是一种取之于敌的手段。在最初开辟根据地的阶段,中国共产党刚刚经历了大革命的失败,群众生活困难,没有稳固的后方和经济财源基础,在这种条件下还不具备征收统一税和发展自身经济的条件,此时打土豪筹款便是取得财政收入最迅速也是最合适的方式。因此,中国共产党认为以这种方式来保障红军和为工农民主政府筹集战费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1927年11月,工农武装占领海丰县后,革命军采用向豪绅地主派款的方式,仅三天就筹得了10万元^②。可见,打土豪筹款是当时解决红军和政府工作人员供给的主要来源,是最快筹措资金的手段。不仅如此,这种方式还是一种推翻豪绅地主阶级反动统治政治任务的手段,是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有利措施。取之于敌不仅能够解除敌人的武装,摧毁他们的物质基础,还能将夺过来的武器和财物分发给红军和穷苦群众,极大地加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根据地的财政基础。第二,建立人民税收。在根据地的不断发展中,不少农民在土地革命中分得了土地,并且在分得的土地上也获得了较好的收成,生活水平得到了保障,已经具备了建立人民税收的条件。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取消一切旧政权的苛捐杂税。另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以土地税和统一的累进所得税为核心的新税制,并按照阶级确定税收负担(即劳动者低税负或者免税,剥削者高税负)。土地革命时期的税收以农业税和商业税为主,农业税“是国家财

政经常性收入中最大的一部分,也是补充红军给养最可靠的来源。”^③中国共产党所征收的农业税同旧中国几千年来反动阶级“取之于民,用之于己”的税收和建立在封建土地制度上的田赋征收办法有着根本的区别。1931年12月,临时中央政府正式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对关于农业税的条文作了许多具体规定,在根据地财政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标志着中央苏区新型的统一累进税制的建立,同时也表明了党的财政工作政策的转变,即由前一阶段以打土豪筹款为主要内容的财政政策转向以建立统一税收来增加财政收入为重点的财政路线上来。除了农业税以外,土地革命时期另一大财政收入来源是商业税。商业税分为营业税和关税。营业税也就是商业所得税,是根据商店的资本来规定税率,然后按其税率征收所得盈利的统一累进税。在土地革命时期的营业税征收中,资本少、盈利少和营业所得额少者税负较轻,反之则较重。关税是商业税的另一大税种,苏维埃政府1933年5月制定了《关税条例》和《关税税率表》,对于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第三,发展国民经济事业。在革命根据地促进国民经济事业的发展,这是支持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一项重要物质基础,也是一种取之于己的方法。这是在根据地扩大巩固时期,由于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革命根据地有所扩大,红军也不断发展壮大,加之土地革命的深入,彻底摧毁了封建生产关系,使农村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因而具备了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1933年临时中央政府在中央根据地召开了经济建设大会,决定利用战争间隙,抓紧进行经济建设,充裕革命战争的物质基础。当时发展国民经济建设事业的中心是大力发展公营经济,苏维埃政府建立了对外贸易局、粮食调剂局等来发展国民经济,这些取之于己的收入为政府提供了稳定的财源基础。

(二)明确财政支出的方针及重点

在财政支出方面,土地革命根据地时期苏维埃政权所采取的财政支出的基本方针是:“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④。可以说,节省国家财政支出的这一方针一直贯穿于整个革命根据地时期。由于当时革命根据地财政的基本任务就是保障战

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年1月。

②王礼琦,李炳俊.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的财政, <http://www.doc88.com/p-6913810425728.html>。

③《农业税暂行税则》,1933年9月18日。

④毛泽东:《我们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页。

争的供给,因此当时革命根据地财政支出的主要部分是军费。除了军费这一占比较大的支出外,根据地还将一部分财政收入用于社会救济、文教卫生等事业,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的深切关怀,军队战士和工作人员也都有着较高的阶级觉悟,能够坚决贯彻执行节省的方针,将节省下的每一个铜板用于战争和革命事业,维护和巩固了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政权。

(三)财政管理体制由分散向统一的转变

土地革命时期的财政管理体制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根据地建设初期,由于到处游击作战、政权分散等客观因素影响,根据地的财政是自筹自给,分散管理的模式,各个地区各自为政,对财政收支没有预算和决算,虽然能够解决军队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开支,但是对于财政收入的分配毫无规划,经常将财政收入分至无用之地,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对财政实行统一管理。1931年11月,中央苏区政府成立了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负责革命根据地财政管理的统筹工作,建立了统一的财政管理组织架构,基本形成了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管理组织体系,整理了过去财政管理混乱的局面。在此基础上,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还建立了统一的预决算制度、会计制度和税收制度,第一次确立了统一财政的思想。虽然中央苏区财政制度在国民党政权的封锁下作用十分有限,但其财政管理制度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展开国家财政治理的初步探索,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

二、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1945年)革命根据地的财政实践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内的阶级矛盾已经转变为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中国共产党推动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并建立了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随着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不断失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建立了包括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苏北、苏中、苏南、淮北、淮南等一大批革命根据地,以根据地为依托,广泛发动群众,壮大武装力量,实施游击战争,打击日寇。在抗战前期,中国共产党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国民政府每月发给八路军的60万

元以及国内外进步人士提供的财力和物力捐款,财政收入来源比较稳定。然而,1941年国民政府停发抗日军饷,并断绝了边区的外援,对边区实施了严重的经济封锁。与此同时,日军也不断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使抗日根据地陷入了经济严重困难的境地。虽然根据地面临着经济极度困难以及人民生活困苦的地,但是中国共产党不畏困难,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工作总方针和“精兵简政”的财政支出总原则,使根据地财政供给由半自给成功实现了完全自给。

(一)适时调整财政收入的政策及来源

在财政收入方面,第一,坚持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政策。抗日根据地时期,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将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在税收收入中,农业税依然占主要地位。但是抗战时期的税收政策与土地革命时期不同,由于除了陕甘宁等老区以外,其余的地区并没有经历土地革命,依旧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在农村中各个阶级同时存在,土地的租佃和典当关系也极其复杂,无法实施统一的税收办法。针对这种情况,在1941年和1942年,晋察冀边区先后颁布和实施了《统一累进税条例》,1943年陕甘宁边区也拟定了《农业税统一累进试行条例》,通过税制改革加强税收工作。将带有收益税性质的公粮和带有财产税性质的田赋融合,并采用累进税制,配合各根据地减租减息的政策,提出了“居民中除极贫者应予免税外,均需按照财产等第或所得多寡,实施程度不同的累进税制,使人民均能负担抗日常费”^①,逐步改变了土地革命时期按阶级成分确定税收负担的原则,减轻了人民的税收负担。除了农业税以外,各革命根据地的各类工商业税收也是抗战时期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为了保护生产并对敌实行经济斗争,扩大抗日民区统一战线,各根据地先后取消了一切苛捐杂税。虽然工商业税在抗战时期占财政收入比例不高,但中国共产党对工商业税的规定体现了发展经济、重视生产的原则,在保障财政收入的同时充分体现出兼顾人民困难、控制赋税规模的性质。第二,征募救国公粮、救国公债。为了克服粮草的困难,从1940年开始,边区政府先后三次向群众借粮,并于1941年11月

^①刘佐:《纵览创建新中国时期的税收政策》,中国财经报,2011(06)。

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一九四一年救国公粮条例》,明确了征收救国公粮的办法。同时,各根据地还纷纷发行了救国公债、救灾公债和经济建设公债。根据地的老百姓积极帮助运公盐和出公盐代金,1941年还买了五百万元公债。为了抗日和建国的需要,人民尽力支持革命政权,大大减轻了当时的财政负担。第三,开展“大生产运动”,开辟财源。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提出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民营的经济,才能保障财政的供给。各根据地本着以解决经济问题作为解决财政问题原则的前提,尽力改善人民的生活,进行了机关学校部队生产自给的“大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政府要求根据各县、区的不同情形酌给投资,除粮食仍由救国公粮供给以外,其余一切费用统统自给。1943年,陕甘宁边区机关生产的收入占到了全部预算收入的64%,生产自给率达到了79.5%;晋绥边区一般机关部队自力更生的收入占其总开支的28%^①。由于大生产运动对经济的有力推动,财政收入逐年上升,边区政府征收救国公粮的数量不断减少,由1943年的18万石减少到了1945年的12万石。各边区机关、部队和学校生产自给的运动开展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极大缓解了当时的财政困难,也论证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的正确性。

(二)实施“精兵简政”的财政支出方针

在财政支出方面,由于抗战时期的革命政权任务就是取得抗战的胜利,因此军费的供给依旧是这个时期最大的财政支出,抗战时期革命根据地的财政支出政策也同土地革命时期一样,是本着节约的方针,为战争和革命事业节省每一个铜板。不仅如此,抗战时期的财政支出政策又发展了节约的方针,为了解决战争中的财政困难,同时还为了保障人民生活,减轻人民的负担,毛泽东同志在节省原则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方针。1942年1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要求各根据地节省民力、物力和财力,必须做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精兵简政”的

方针提出以后,各个根据地都积极响应号召。通过各根据地的“精兵简政”,机关部队的人员都流向了生产部门,既减少了不必要的财政支出,还提高了生产力,极大地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至1944年,陕甘宁边区的军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就从80%下降至45%^②,这一方面得益于厉行节约的财政支出政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通过“精兵简政”方针提高了财政收入,将支出用于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的福利。

(三)实行“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财政管理体制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财政体制管理方针,例如晋冀察边区以统筹统支为行政方向,致力于建设正规化的基础财政制度,其中包括建立健全预决算制度、会计及金库制度、审计制度等。虽然这个时期处在敌伪分割和封锁的境况下,财政体制和管理只能以各边区为单位分散经营,各大解放区之间也无法做到财政制度的完全统一,但其建立的预决算制度为后来正规化基础财政制度的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1949年)革命根据地的财政实践

抗日战争的胜利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翼势力,不顾广大人民和平建国的愿望,悍然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就是依托各解放区和东北根据地,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统治,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性胜利,建立新中国。因此,在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根据地的经济、财政和税收工作,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继续精兵简政,减轻民负;坚持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方针,生产和节约并重,并且确定了新解放区的税收政策,开始考虑新中国的财政体制和税制建设等问题。

(一)财政收入政策及来源的转变

在财政收入方面,第一,进一步完善税收政策。税收收入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始终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解放战争时期征收农业税也依然是中国共产党获取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在这一时期,农业税的征收分新解放区和老解放区,实施不同办法。

^①薛子正:《自己动手,解决困难》,《群众》第9卷。

^②左治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财政》,财经科学,1980(02)。

凡是已经实行土地改革的老解放区,将过去按累进税率征收的救国公粮改为按常年应产量比例征收的农业税,减轻了人民的税收负担;而在新解放区仍按累进计征,同时还要对地主和富农加征土地税,并将土地税与其收入合并计算累进计征。在征收农业税的同时,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抗战时期一样,坚持征收工商业税。这一时期工商业税的征收以不影响工商业的经营和发展为原则,虽然工商业税在根据地期间财政收入中占比只在10%以内,但是通过工商业税的征收能够起到保护生产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保障了根据地的财源。第二,重视自身经济建设,发展生产。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提出了在发展生产时要集中领导、分散经营,并且要军民兼顾、公私兼顾。虽然由于战区的不断扩大,根据地的大量部队和工作人员都被调赴前方和新解放的地区,使得这个阶段生产的规模有所缩小,生产所带来的收入也没有明显增加,但是发展经济的方针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财政体制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通过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生产建设,解放区人民在中共的领导下逐步完成了土地改革,工商业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大力发展公营经济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注意扶植私营企业,保护自由贸易,对交易进行正确管理。第三,从整体财政收入构成上来看,这一时期的财政收入呈现出了由战时向和平、由农村向城市的演进,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解放区税收工作的重点逐步转向城市,并将更多的重要城市工商税收纳入了管理范围。尽管农业税收入仍是税收收入占比最大的一项,但同时期的工商业税收入占比也呈现出逐渐增加的趋势。同时,这一时期税务机关不断改进征管方式,开始作为专业机关独立开展组织财政收入的工作,提高了征收效率。这都表明解放战争时期的财政工作已经朝着更加专业化和精细化的管理方式改进。

(二) 财政支出方针及结构的转变

在财政支出方面,根据地时期军费支出一直是

占据财政支出最大的一项,为了应对消耗巨大的战争,党在解放区仍然坚持贯彻厉行节约方针。毛泽东同志指出“发展生产,保障供给,集中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生产和节约并重等项原则,仍是解决财经问题的适当的方针”^①。1946年7月,他指出必须十分节省地使用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力戒浪费,并且坚持要一面发展生产,一面用大力量整理财政,节省一切非必要的开支,降低干部生活水平,表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严禁铺张浪费、贪污腐化。华东解放区为缓解财粮供应的矛盾,在实行精简的同时,狠抓开支的节约。同时,解放战争时期,财政支出结构开始由“支援战争”向“发展生产”转移。据统计,华北人民政府1948年在晋冀鲁豫财政支出中,军费支出占比为80%,只有少量数额的支出用于建设费、文教费等。但在1949年,军费占支出总额就下降到了66.76%,事业费支出占比为13.53%^②。可见,解放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的财政工作重心由供给型向建设型转变,为新中国的财政工作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 逐步建立集中统一管理的财政体制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革命战争的节节胜利,原来分散的财政管理无法为大规模的战争提供资金保障,也不能满足集中社会资源进行生产发展的要求,因此,根据地的财政管理体制逐步趋于集中化。以华北地区为例,为了保障财政工作的集中统一,华北人民政府设立了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独立于财政部之外,直接对中共中央负责,以确保财权集中并对财政政策及时做出调整。华北人民政府对财政收入享有优先支配权,“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③。为了保障统收统支制度的执行效果,华北区的财政收支由华北政府统一支配,各行署的收支也需执行严格的预算和审计制度,经华北人民政府核准后才能予以拨给。1948年10月,华北人民政府出台了《关于统一华北财政工作的决定》,中指出:为了适应战争形式要求,统一全区的财政和税收政策,在财政困难和制度不统一的前提下要加强财政工作的集中统一,将一切力量用于战争,使一切制度完全一致。

①毛泽东:《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6页。

②华北人民政府秘书厅编:《华北人民政府一年来工作报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资料室1949年版,第57-58页。

③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页。

1949年2月24日,华北人民政府又通过了《华北区暂行审计规程》,明确要求“区财政及地方财政之一切支出,须事先预算,事后计算,无预算不准开支,无计算不准报销”^①。由此,华北地区真正实现了集中统一制,并基本实现了从单一农村财政向综合财政的转变。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财政经济管理方面的积极探索和实践为新中国财政工作的开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且为新民主主义财政管理制度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四、党领导下根据地时期财政实践的历史经验

(一)发展国民经济是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途径

在革命根据地建立初期,根据地的财政收入来源主要依靠打土豪筹款和捐款,这种取之于他人的收入来源手段虽然筹款效率高,但是却不稳定,同时也不能维持日益增长的军事费用支出。因此,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财政实践中摸索出了通过发展自身经济来获取稳定财政来源的方式。毛泽东同志在总结财政工作中指出:“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②,强调决定财政的是经济。在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发展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合作社等一系列政策,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民营经济,保障财政的供给。通过经济发展来增加人民收入,从而增加税源,获得稳定可靠的财政收入来源无论在革命根据地时期,还是在当下,都应当是财政工作应该遵循的准则。

(二)建立适合的财政体制是解决财政问题的重要保证

革命根据地时期的财政制度虽然并不成熟,但是其在财政管理上的探索却意义深远。土地革命前期,根据地的财政没有统一领导和统一制度,各个地区的财政收入都是随筹随用,自收自支,没有对收入的计划和安排。这种财政分散现象是革命时期的必然结果,这是因为根据地是在分散的战争环境

下建立起来的,财政管理必然会存在着分散的现象。为了解决这种财政混乱的现象,中国共产党决定将当时十分有限的财力集中起来,实行统一财政。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为统一财政提供了客观条件,中央政府规定各级财政机关应由上而下第指挥和监督各下级机关财政,并且提出了一切国家税收由各级财政机关按照中央规定税则征收、各级财政机关的一切收入应随时送交中央财政部,不得自行支配扣用等一系列规定,初步建立了统一财政,分级管理的体系。但是在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只能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确定财政收支,其财政规章制度也都仅适用于各个地区。直到解放战争时期,为了进一步集中力量完成解放任务,各个边区都建立了统筹统支制度,规定工商营业税、进出口税等几种主要财政收入由边区统一管理,其他财政收入则由下级机关管理,在大区内统一财政管理制度,制定统一税法、供给标准、预决算制度等,实现了由分散到集中,由政策统一到全部统一的进程。统一财政,分级管理不仅能够有利于方针政策的贯彻,还能够赋予地方一定的机动财权和财力,发挥各地区增收节支的积极性,对当下的财政工作也有着不可忽视的指导意义。

(三)厉行节约是保证财政充裕的必要手段

革命根据地往往处于条件艰苦、经济相对落后的地位,因此,强调节约开支是非常重要的。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在主张节约开支的方针时特别强调:“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③。1941年-1942年,根据地财政发生严重困难,日军不断发动侵略、国民党停发军饷以及实行经济封锁导致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进入抗战最艰苦岁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厉行节约和“精兵简政”方针,厉行节约就是坚决反对铺张浪费,将有限的资源用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部位,精兵简政通过减少机关冗余人员,提高了生产效率,为解决根据地的财政困难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可以说厉行节约和精兵简政是中国共产党应对和化解财政困难的成功实践,不论是在革命根据地时期,还是在提倡过紧日子的当下,这两种精神都应该成为党员干部的一种自觉和行为习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项优良传统。习近平总书

①《华北区暂行审计规程》,《华北政报》,1949年3月1日。

②毛泽东:《我们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页。

③13 毛泽东:《我们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页。

记曾指出,“不论国家发展到什么水平,不论人民生活改善到什么地步,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永远不能丢”^①。在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财政实践解决了革命战争特殊环境下的财政困难,为取得革命胜利提供了坚强保障。进入新时代,虽然我国经济实力和财力已今非昔比,但面临的不确定性和各种风险挑战依然存在,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下行、疫情肆虐的当前,财政工作的任务更为艰巨。因此,必须以史为鉴,学习根据地时期厉行节约的经验,把勤俭节约作为财政工作长期坚持的方针,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保驾护航。

(四) 合理调整财税政策是解决财政问题的科学态度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时期的财税思想始终是处于不断调整状态中的。从刚建立起革命根据地时的打土豪筹款,到逐渐通过发展经济建立税收解决财政问题,中国共产党的财政思想一直处于螺旋上升状态。通过财税政策的灵活调整,根据地的财政收入逐渐变得稳定,并且通过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而且实事求是的财税政策能够使中国共产党及时纠正不正确的财税观点。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批评了当时片面的“仁政”错误观点,提出了“人民负担虽然一时有些重,但是战胜了政府和军队的难关,支持了抗战,打败了敌人,人民有好日子过,这个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的正确思想。同时也批评了“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②的错误思想。通过对这些错误思想的批判,中国共产党才能在抗战时期通过发展经济,加大供给能力,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中国共产党的财政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活的行动指南,实事求是调整财税政策的思想应始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财政工作中,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阶段,中共的财政工作必须要根据局势变化,回应时代的需求,以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为财政工作的目标和任务,针对经济社及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及时调整财税政策,坚持在现代化进程中推进财政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五) 彰显人民性是党领导下的财政的根本宗旨

党领导的根据地财政实践始终秉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为基本原则,在税收政策上实行“贫富区分”,通过发展根据地的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条件进而获得稳定的财政收入,这在本质上就区别于国民党的巧取豪夺,这也是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凝聚党心民心,领导人民走向革命的最后胜利。这种“以人民为中心”和“人民至上”的财政精神同样适用于新时代的财政工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应该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下一阶段财政工作的重点,坚持为人民办财政。这就要求财政工作要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将全面布局与重点投资相结合,调节社会财富分配,在全球经济放缓的当下进一步减税降费,促进企业发展,让社会主义财政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坚实保障。

参考文献:

- [1] 孙文学,齐海鹏.中国财政史[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
- [2] 赵秀山.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
- [3] 万立明.党在历史上如何过“紧日子”[J].人民论坛,2020(23).
- [4] 毛泽东选集[M].人民出版社,1991.
- [5] 韩晓青.精兵简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N].学习时报,2018.
- [6] 魏宏运.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7.
- [7] 朱忠明.试论毛泽东理财思想及当代意义[J].财政研究,2010(11).
- [8] 中学锋.党在革命时期的厉行节约及现实意义[J].财政科学,2020(9).
- [9] 冯田夫.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战时财政史[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
- [10] 陈光焱.中国财政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史[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 [11] 楼继伟.40年重大财税改革的回顾[J].财政研究,2019(2).
- [12] 姜长青.新中国财政体制70年财政体制改革的基本历程、逻辑主线与核心问题[J].改革,2019,(5).
- [13] 刘欣,景占魁.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 王东伟】

①2019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发表的讲话。

②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4页。